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述略
——以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为例

肖永明　陈　峰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长沙　410082)

摘　要: 学界对清代湘学史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晚清部分,而对清代前中期的湖湘学术(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经学史)研究不多。从湖南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来看,明末清初的湖南确实不能算作“人文被沾”之地。然而自王夫之以后,清初的湖南说经注经者不绝如缕。雍乾之际,学风丕变,湖南仍有一些以经学名家的学者,留下了相当可观的经学著作,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家多重视礼学,强调践履与实用;不分汉宋而博采诸长。这些共同特征,不仅使得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对晚清湘学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湖湘经学;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
中图分类号:B 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1-0090-09

晚清以降,湖南士人以赫赫事功闻名天下,晚清湘学亦有异军突起之势。学界在晚清湘学研究的领域已有较多的成果,而对清代前中期(顺康至于乾嘉)的湖湘学术关注不多。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认为,清初的湖南地区“学者极少”。梁氏进而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

> 湖南自衡阳王船山(夫之)以孤介拔俗之姿,沉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骘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虽然,壤地窎僻,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门下复无能负荷而广大之者,是以其学不传。自兹以往,百余年间,湖湘学者无述焉。①

这是学界对清初湘学的一般意见。而郭嵩焘又说:“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②,直指湖南地区的学术在乾嘉之时是隔绝于考据学之外的。梁启超与郭嵩焘的论断影响甚大,故研究者多以为清代前中期的湖湘学术不足称道。

经学作为四部之首,在传统学术中占有核心地位。从湖南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来看,明末清初的湖南确实不能算作“人文被沾”之地。然而自王夫之以后,清初的湖南说经注经者不绝如缕。雍乾之际,学风丕变,湖南仍有一些以经学名家的学者,留下了相当可观的经学著作。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提供了前提。李肖聃《湘学略》、王盾《湘学志略》、陈代湘主编《湖湘学案》以及方克立、陈代湘《湘学史》对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史、经学家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均未能把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选取清代前中期湘籍著名学者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为研究对象,对其经学著述的基本思想与特点进行介绍与分析,以彰显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的基本脉络,明晰此期的湖湘经学在湖湘经学史乃至明清学术史上的地位。

一、李文炤的经学

李文炤(1672—1735),字元朗,号恒斋,湖南善化人,清初湖南地区著名的经学家。根据李华芳《李恒斋先生行述》、周正《李恒斋先生墓志铭》

收稿日期:2014-08-10
作者简介:肖永明,男,湖南武冈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四书”学史》(项目号 13&ZD060)。

①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 年,第一卷第一期,第 32 页。

② 郭嵩焘:《罗研生墓志铭》,《养知书屋文集》,光绪十八年刻本,卷二十一。

等文献的记载:李文炤在早年结识善化熊超、邵阳车无咎等学者,遂以周、张、程、朱之学为“入学之门”。① 又从沩山张石攻、邵阳王醒斋等人问学,“自后潜心理学,其于科举业淡如也”。②李文炤虽在康熙五十二年考取举人的功名,但绝意于仕途,婉拒了所授予的谷城教谕一职。康熙五十六年,李文炤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李氏阐扬程朱之正学,修订《岳麓书院学规》,“四方闻而景从者,不减百人”③,可见李文炤的学问在当时的湖南是有一定影响的。

李文炤对入仕为官无甚兴趣,而终生沉潜于学问,于经、子、集三部皆有撰述,其中以解经之作最夥,说解理学著作之书次之。解经之作中,《周易本义拾遗》六卷、《周礼集传》六卷、《春秋集传》十卷被著录于四库存目类;《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四十六卷④,《家礼拾遗》五卷《附录》一卷等皆是李文炤的用心之作。李氏说解理学诸书中,有《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正蒙集解》九卷、《太极解拾遗》一卷、《通书解拾遗》一卷、《西铭解拾遗》一卷,皆著录于四库存目类。李文炤所撰的《恒斋文集》中,除有不少说解六经的文章外,还有以诠释与称颂程朱理学为主题的诗作。

1. 李文炤的经学旨趣

关于李文炤治经的学术旨趣,前贤的记叙或研究中有两种略微不同的意见。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八将李文炤与方苞等人并列入“守道学案”中,并对其生平有简要介绍。而后李肖聃《湘学略·恒斋学案第八》、杨树达《〈恒斋文集〉提要》中皆指出,李文炤治经以朱子之学为宗。最近有关李文炤研究的著作中,方克立、陈代湘《湘学史》,陈代湘《湖湘学案》,杨旭的硕士论文《李文炤礼学思想研究》都认同李、杨的观点。

而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目》列“薑斋学案”一目,以王夫之、罗泽南为传主,附列李文炤、邓显鹤为“别出”之学者。⑤ 刘氏的划分虽有新意,但未能说明理由。徐世昌所编《清儒学案》则称:

> 湖湘之间,自船山王氏后,多潜修其著述。可称学术纯正者,推恒斋李氏。同游诸人,皆恪守程朱之说。当时未大显,镜海唐氏乃表章之。⑥

《清儒学案》认为船山之学代表了清初湖南学术的最高成就,虽在清初的特殊环境下无法光大,但在湖南境内却又一批“潜修其著述”的学者。《清儒学案》一方面认为李文炤“学术纯正”“恪守程朱之说”,与唐鉴等人的观点相同;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李文炤等学者研修船山著作的“事实”,试图说明船山之学对李文炤等学者的影响。

上述两种判断,当以“李氏学以朱子为宗”的论断更为准确。朱子作《周易本义》《太极解》《通书解》等,李文炤在朱子的基础上略有补充完善,故李氏相关著述均题以“拾遗”,以示尊崇之意;朱子对于《周礼》的研究没有专书,李氏则仿照朱子《诗集传》、蔡沉《尚书集传》之体例,旁采宋明儒者的解经成果,撰成《周礼集传》。从义理方面看,李氏更多的是复述朱子的理学观点,如《恒斋文集》卷三《论》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论》《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论》《仲尼颜子所乐何事论》诸篇,诠释“太极”“无极”“气化”“孔颜乐处”等概念,皆以朱子之说为准的。相反,李文炤的经学著作与文集中,只有在《楚辞集注拾遗序》中提及船山的《楚辞通释》,并无更多论述船山之学的言论。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刘师培、徐世昌等人关于李文炤之学颇受船山学影响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2. 李文炤的经学史观

考辨与评骘历代经学源流,是学者研究经学的重要一环。经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

① 周正:《李恒斋先生墓志铭》,《李文炤集》,长沙:岳麓书社 2012 年版,第 230 页。
② 李芳华:《李恒斋先生行述》,《李文炤集》,第 225 页。
③ 李芳华:《李恒斋先生行述》,《李文炤集》,第 227 页。
④ 光绪《湖南通志》又作《仪礼经传通解集注》。《增删仪礼经传通解》虽未流传至今,但可从《恒斋文集》卷一《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序》窥其大要。
⑤ 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目》,李妙根编、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中西书局 2012 年版,第 123 页。
⑥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155 页。

在解经时的材料选取、价值评判等问题。那么,在李文炤看来,六经无疑是经学史的源头,而汉唐至明代的经学诠解之作则是流衍。李文炤在评论前代经学源流时曾有一种粗略的划分,其云:

> 汉注唐疏,管窥蠡测者也。宋儒传注,神会心得者也。然度数之纷赜,可考而知之;义理之精微,可思而得之。①

在李氏的观念中,汉唐经学讲求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其主要的为学取径在考证;而宋代(至于清初)的学术以理学为主,更重视学者自身的思辨与体认。经学史上的考证派与义理派之间,虽然研究对象不同、入学门径有异,但均属经学的重要流派。同样,考证派与义理学均有自身的缺陷。李文炤在评议明初所修《春秋大全》时曾说:

> 汉儒解经而经亡,明儒遵传而传晦,厥罪惟均而已矣。……欲望其一道德而同风俗也,岂不难哉?②

汉儒以固守师承家法而使得经学走向中衰,明廷因偏尊胡安国《春秋传》而使学术弊病丛生。在经学史上,一旦某种研究范式被过分推崇,那就无法避免沦入僵化与衰落的局面。因此,在李文炤的经学史观中,汉唐经学与宋明经学两派,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气盛行,而到乾嘉之时却形成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学术取向。如果将李文炤的这些论断,置于明清之际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便可知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可视为不偏不倚的通贯之说。

李文炤在通论经学史时虽有较为通贯的认识,但他对每朝的经学思想与经学成就的具体评价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李文炤尽管称赞汉唐经学为"管窥蠡测"之学,实则他的经学著作与文集中,对汉唐的经学注疏不甚措意。以《周易本义拾遗》为例,李氏在此书中都较少直接引述汉注唐疏。《拾遗》采用"本卦六画冠首"的诠释角度,虽与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相关论述暗合,但李氏亦无提及贾《疏》之处。相反,《拾遗》更多的是吸收了程颐、归有光等人的观点。《周礼集传》《春秋集传》均以采录宋明儒者之说为主,李文炤显然更倾向于宋明经学的为学路径。李文炤对宋代经学评价较高,宋代程朱理学所昌明的道统,便是儒家的正宗。而朱子在李氏心中便是道学的宗主,其所编《语类约编》的序言说:

> 宋之道统,先知先觉,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则,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无内无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贞乎。③

这种论断与李氏的治经旨趣是颇为一致的。相应的,李文炤对明代宗朱的学者评价也较高。《恒斋文集》中虽在多处力辟湛若水、陈献章、王阳明之说,但对薛瑄、吴与弼的理学成就颇为推崇。

需要指出的是,在李文炤所理解的经学史中,"经学"与"理学"并不是判然两分的。李氏也并不将程朱理学当作完美的教条加以崇奉,而是在认同程朱理学的基本框架下有所补充完善。李文炤在于同乡黄琰(上珍)论学时曾说:

> 盖朱子之于圣学,譬诸李沆、韩琦,安社稷则有馀,拓边境则未暇。故四子之精蕴阐发无遗,而六经之名物度数,则未免于阔略也。④

以往的研究者,多未注意李文炤对朱子学的批评意见。尽管自明初以来,不少学者以述朱为能事,对朱子的理学推崇备至。而李文炤虽墨守朱子的理学观点,但对朱子有关名物制度的研究有所保留。李氏将"经学"与"理学"绾而为一,统归于礼学。故李文炤在三礼学上用力最勤,所作的《周礼集传》《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家礼拾遗》旨在补充与修正朱子的礼学。

3. 李文炤的礼学

台湾学者邓克铭曾指出清初的学者"在批判明末空谈心性的声浪中,礼学的重建,最足以显示扎实的学问性"。⑤清初礼学的兴起,既有统治者积极提倡的因素,也是经学史自身发展演变的必

① 李文炤:《经策》,《李文炤集》,第 62 页。
② 李文炤:《大全辩》,《李文炤集》,第 44 页。
③ 李文炤:《语类约编序》,《李文炤集》,第 15 页。
④ 李文炤:《与黄上珍》,《李文炤集》,第 94 页。
⑤ 邓克铭:《宋代理概念之开展》,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8 页。

然结果。前文已揭,李文炤于群经之中,最重三礼。而李氏在经学研究中,礼学的成就最大。其所撰《周礼集传》《家礼拾遗》《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在观点与方法上多师法于宋明儒者。

在三《礼》之中,李文炤对《周礼》用力最勤,所撰《周礼集传》是他治经的代表作。《周礼集传》著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之类。四库馆臣对《周礼集传》评价颇低,以为此书不过是宋明礼学之余绪而已。馆臣的论断,自有其预设的背景。如果回顾到李文炤本身的撰述理路来审视此书,则此书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周礼集传》的体例与取材。每卷之前均有解题,在解释具体名物制度之时基本上是随文衍义。根据杨旭的统计,《周礼集传》征引前代学者的治经言论达九百余条,而其中采录宋明儒者之说尤多。

(二)《周礼集传》对《冬官》的处理。《冬官》缺亡既久,后世儒者亦往往深以为憾。如李文炤便感叹:"《冬官》之职亡,而天下之废事多矣。"①自宋代俞廷椿以来,补述《冬官》之作不绝如缕。而李文炤对俞廷椿、何乔新等人割裂"五官"中以补《冬官》的作法不以为然。李氏认为,要补《冬官》,当"旁搜官名于传记之中,以志其梗概"②。从《周礼集传》来看,李文炤补《冬官》的取材主要在《国语》《逸周书》《四民月令》等书。相较宋明以来的补《冬官》之作,李氏在取材上亦稍有新意。不过在馆臣看来,这也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师心自用罢了。

(三)对《考工记》的相关论断。厘清《考工记》的作者与成书时间,是清代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李文炤在《周礼集传》与《十三经源流辨》中曾说:

> 《考工记》乃周人省试百工之书,观其国号有秦,殆东迁以后之所作乎?详于车制而不及舟,则必出于西北人信矣。③

杨树达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为李文炤《恒斋文集》作提要时,曾称赞李氏此说与江永之说相同,并且成熟更早。而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考工记一》考证如下:

> 《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秦无卢,郑之刀,厉王对其子友,始有郑。东迁后,以西周故地与秦,始有秦,故知为东周时书。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④

从二者有关《考工记》的成书时间来看,二者确实是一致的。李文炤以《考工记》不详于舟,便判定《考工记》的作者是西北人;而江永则通过《周礼》郑注断定作者为齐人。李、江二说实则有较大差异。江永的意见为后来大多数礼学家所接受。而李氏申辩未详,只是在此提出了某种猜测。这种治经的取向,在李文炤其他的经学著作与文章中有所体现。

此外,李文炤尚撰有《家礼拾遗》五卷。其书大旨是通过《仪礼》与《家礼》的互证,彰显程朱理学的伦理观念,将《朱子家礼》中所涉及名物制度解释得更为详细精确,同时力辟佛老之说。综上所言,李氏在治《礼》时仍是深受宋明儒者的影响。从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的系谱中看,李文炤治《礼》的最大的成就是将程朱的性理之学与有关《三礼》的名物制度研究绾而为一,使程朱理学中伦理的神圣性与规范性透过礼制落实在践履之中。

二、王文清的经学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湖南宁乡人。后世学人将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与王文清并称为清代湖南"四王",推崇王文清为清代湖南地区著名的经史大家。在清代湖湘经学的研究中,有关王夫之、王闿运与王先谦(亦有学者合称此三人为"三王")学术的研究成果已有汗牛充

① 李文炤:《杂录》,《李文炤集》,第 201 页。

② 李文炤:《周礼集传序》,《李文炤集》,第 240 页。

③ 李文炤:《十三经源流辨》,《李文炤集》,第 39 页。

④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考工记一》,《皇清经解》本,卷二百四十九。

栋之势,而有关王文清学术成就的研究却极为有限。

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第七》专列“王文清”一目,对王氏的经史著作、经学旨趣进行了介绍。张舜徽在评价王文清的学术地位时说:

> (王文清)研究经学,造诣很深,实开湖湘朴学之风,是一位承先启后、很有影响的人物。①

王文清在早年曾与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有过交往,《李文炤集》中《与王廷鉴》可为佐证。根据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谱》的记载,王文清于乾隆元年(1736)起充任三礼馆纂修官,并在此后兼任律吕、经史诸馆职。乾隆十一年(1746),诸馆书成,“吏部议叙第一”,后方“以父老再请终养,遂归”。② 王文清由京返湘后,曾于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二十九年(1764)两度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在岳麓书院山长任内,修订学规,作育人才,成为清代岳麓书院史上继李文炤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山长。其中最值得学者注意的是,王文清有较长的时间供职于三礼馆、律吕馆,与当时学界的名儒硕彦(如惠士奇、方苞、杭世骏、李清植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将当时兴起的考证之学引入湖南,培养了余廷灿等一大批湘学后劲。因此,王文清不仅是乾隆时期主流学界的预流者,同时也是湖湘经学系谱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王文清享年既久,治学兴趣广泛,著述亦堪称宏富。吕泰《十学薪传序》记录了王文清在《易》、《书》、《诗》、三《礼》、乐、《春秋》、天文、地理、算术、《说文》等十个学术领域的主要观点。王文清的六世孙王赓猷《锄经馀草跋》③、今人寻霖《王文清著述叙略》④对王文清的著作的版本与存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王氏的诸多著述中,《考古源流》六百二十八卷、《典制大义考》⑤一百四十卷是王氏用力最深的学术著作。《考古源流》、《典制大义考》的手稿均因晚清战火而未能保存下来。现存王文清的著作有《考古略》八卷、《锄经馀草》十六卷、《锄经续草》四卷等。《考古略》本为《考古源流》的节本,著录于《四库全书》子部存目类。通过《考古略》以研究王文清的经学思想与成就,虽是文献不足征的无奈之举,但是此书考证诸经,征引繁富,判断精审,为王氏从《考古源流》中“抽其浅近而切要者”⑥以印刻行世,故也颇能反映王文清经学造诣。

王氏所著《考古略》是汇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玉海》《册府元龟》等典制体著述而编成。从《考古略》的体例来看,以考证音韵、文字居首,次以辨析诸经源流、体例,然后再讨论古今制度沿革的问题(包括氏族、宗法、丧礼、学制、刑律、律吕等)。就书中所反映的王文清经学成就来看,有如下两点最值得学者关注:(1)与乾隆之前的湖湘经学家相比,王文清重视音韵、文字的辨析。他的音韵学思想,是在顾炎武等学者的影响下修正损益而成的;(2)王文清在《考古略》中特重古今礼制,既有通论三礼的宏观之论,亦有不少精微的考据。王氏在通论三《礼》关系等问题时,兼采郑玄、朱熹之论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在考证诸礼时,则主张“无征不信”,汇通经史以成其论断。以下试分而论之。

1.《考古略》中的音韵学思想

王文清《考古略》卷首三节便是《经文字音考略一》《经文字音考略二》《四书字音考略》。在王文清看来,《四书》《五经》中的字义,往往随着字音的变化而改变。如《四书》中的“道”字,言“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时当读去声,而言“大学之道”“率性之道”“士志于道”时则当读上声。前者为道说之义,后者则是道理之义。王文清认为,如果不能正确辨别经书中的字音,则无法理解字义,最终则会可能会在理解经书义理时出现偏差。这

① 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第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1 页。

② 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谱》,《湖南人物年谱》(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81 页。

③ 王赓猷:《锄经馀草跋》,《王文清集》(二),长沙:岳麓书社 2013 年版,第 500—501 页。

④ 寻霖:《王文清著述叙略》,《湖南文史丛谈》(二),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9—63 页。

⑤ 亦有学者著录此书为《典制大文考》。

⑥ 王文清:《〈考古略〉凡例》,《王文清集》(二),第 507 页。

种看法与钱大昕、戴震等人“因声知义”的治经主张是如出一辙的。此外,《考古略》卷一中《诗人用韵法考略》《〈诗经〉叶韵法考略》《〈诗经〉古韵考略一》《〈诗经〉古韵考略二》等节讨论了《诗经》中的古韵问题。

宋儒的叶音说在明末清初时便受到陈第、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的质疑。顾炎武激烈地批评了叶音说,在《音学五书》《唐韵正》等书中提出了“四声一贯”的理论。王文清受到顾炎武的影响,也主张“古韵四声通用”。王文清解释《诗经》叶音之说的成因时曾说:

> 问:诗韵之叶音也,诗人为之乎? 曰:风土异宜,而喉舌有清浊之异;方言殊习,而传袭有甄石之殊。故古人作诗之时,未尝纽捏以求叶也。其矢歌以成章者,皆其韵之本如此呼。且呼之而本合,在古人道其常,而后人以为叶尔。①

在王文清看来,古韵中的四声通用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而宋代以来的研究者多从叶音的角度去分析古韵,所得往往不确。王氏还将这种意见引入到其他经书的研究中去,如王氏所云:

> 古韵四音通用,平上去入,俱可相叶。上之《易·文言·象传》,下之《离骚》皆然,不必拘拘仅以一音叶也。②

然而,王文清对叶音之说亦未完全否认。曾有学者向王文清请教《诗经》中的“叶韵之法”,王文清首先肯定了当时诗人所用之韵自然相叶,而“叶韵之法,有常有变。用其常以顺乎抑扬阖辟之致,尽其变以极其参伍错综之情”。③ 他对朱熹的叶音说亦无激烈的批评,只是认为朱子《诗传》是“用吴才老之韵,而从之以立言耳”④。王文清对于宋以来盛行的叶音说虽有批评,与陈第、顾炎武之说相近,但王氏对宋儒的叶韵说并未完全否认。正如周祖谟所说,即便是顾炎武的《诗本音》亦未能彻底否定叶音的存在,且顾氏“四声一贯”的“转音”之说,又与宋人的叶音说在方法论上实则相差无几。⑤ 由上观之,王文清对叶音说有较为通贯平实的认识,他既不满以叶音牵合古韵的做法,同时对宋儒叶音说亦有相当的肯定。这种持平之论在汉学炽盛的乾隆之时是难能可贵的。

2.《考古略》中的礼学研究

王文清曾在三礼馆任职十年之久,参与了《三礼义疏》等著作的编纂。王文清曾撰《周礼会要》一书,被著录于四库存目之类。《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在诠解《周礼》时对本经“不多一字”,亦“不少一字”,是符合汉学师法的。王文清也曾站在汉学家的立场激烈地批评俞廷椿、何乔新、舒芬等人妄补《冬官》的作为,以为“一经割裂,并五官亦不完矣”。⑥王文清的礼学成就为当世所称道,《考古略》是其礼学精华所在,其中既包括王氏通论三《礼》关系的意见,也其关于礼制细节的考辨。

王文清善于从三《礼》关系的宏观角度去把握诸礼的地位,汇通诸家之说以成其判断。《考古略·仪礼问答考略一》中记载:

> 问:三《礼》孰经孰传? 曰:《仪礼》乃本经,《礼记》是解《仪礼》之义,《周礼》则为之纲纪。⑦

王氏从文献形成的角度出发,分辨本末,试图将三《礼》统摄为一个体用兼备的体系。又如王氏解释“经礼”“曲礼”时曾说:

> 郑康成序《礼》曰:“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周官》、《仪礼》有体履之别矣。《周官》为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乎物,是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万物贵贱高下,大小文质,各得其体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

---

① 王文清:《考古略卷一·诗经古韵考略一》,《王文清集》(二),第 543 页。
② 王文清:《考古略卷一·诗经古韵考略一》,《王文清集》(二),第 545 页。
③ 王文清:《考古略卷一·诗经叶韵法考略》,《王文清集》(二),第 543 页。
④ 王文清:《考古略卷一·诗经古韵考略一》,《王文清集》(二),第 545 页。
⑤ 周祖谟,《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 1966 年版,第 35 页。
⑥ 王文清:《考古略卷二·周官问答考略》,《王文清集》(二),第 591 页。
⑦ 王文清:《考古略卷二·仪礼问答考略》,《王文清集》(二),第 593 页。

之事,物虽万体,皆同一履。①

王文清在明辨《仪礼》与《周礼》关系时,从郑玄的注解出发,将程朱理学体用论、心性论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这对于厘清诸《礼》经与礼制是有所裨益的。王氏的这些判断,在《三礼义疏》中也有所体现。

至于王文清考辨礼制详节方面的文字,《考古略》中则有更多的例证。在明末清初的湖湘学者群体中,王文清对汉注唐疏甚为措意。如《丧服所始考略》一篇考证丧服的起源,王氏便以郑玄关于《丧服小记》的注解为准;又如《六艺考略》解释"六艺"的诸名目,王氏则径取贾公彦《周礼疏》。总体来看,王文清研治礼学时更倾向于汉儒之法,但对宋儒(特别是朱熹)的礼学观点也有相当的尊重。

三、余廷灿的经学

余廷灿(1729—1798),字卿雯,号存吾,清代长沙县人,有《存吾文稿》四卷、《诒谷堂诗集》一卷存世。余廷灿是清代湖南地区继王文清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经学家,他在研究经学时贯通子史,不分汉宋畛域,尤其擅长天象经纬、几何勾股、律吕音韵等学问。余廷灿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充任翰林院检讨。

余廷灿生逢乾嘉之时,考据之学甚为炽盛。前文已揭,郭嵩焘便认为在乾嘉之时湖南地区"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而以往研究湘学史的学者,往往直接接受了郭嵩焘的论断,以为乾嘉之时的湖南经学仍是抱残守缺,与汉学的风气了无相涉。郭嵩焘的这段议论或受时势的影响,或受自身识见的限制,与史实并不相符。乾嘉之际的湖南经学家,如王文清、余廷灿等,既服膺于程朱之教,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汉学的观点与方法。根据余廷灿在《存吾文稿》中的回忆,余氏早年曾向王文清讨教治经门径等问题,王文清径答以"熟读《十三经注疏》"。余廷灿在《寝衣辨》中也说"《说文》之大有功于《十三经》,而治《十三经》者诚不可不读《说文》矣"。②由此可见,乾嘉之时的湖南经学家已经开始正视汉学的观点,并修正了自身的为学之法。而余廷灿屡至北京,与当时一流的汉学家交往甚密,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汉学家。余廷灿研治经学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存吾文稿》中。从《存吾文稿》的"杂著""书""传"中可以窥见余氏研究经学的三项特点:一、汉宋兼采:既尊程朱之教,又服膺考据之法;二、博综三礼,尤擅考证礼制;三、转益多师,与名儒反复辩难,预"乾嘉汉学"之流。以下试分而论之。

1. 余氏治经之汉宋兼采

当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时,学界不少大儒均视宋学如草芥。高谈程朱义理之徒,往往被汉学家打入另册。余廷灿则对鄙蔑程朱义理之学的风气不以为然。《存吾文稿》卷首"杂著"部分则有《原文》《原心学》《原才》《无极主静辨》《慎微》《显微》《诂易》诸篇,大旨皆在申论周敦颐、朱熹的理学观点。如《原心学》一篇中说"心妙万物,于其变而能以意造有者也;性涵万物,于其天而不容以人参伪者也。性不与心杂糅,而心亦本不与性分割者也"③,此段援引朱子之说,简而有要地概述了心与性的关系,同时力辟佛道说心性之虚妄。又如《原才》一篇中说"性无形而才有质,专言性则人与物共焉者也;兼言才则人与物分焉者也"④,余氏以"才"的有无来划分人与物,又以"才"的大小来解释孔子所言"性相近"之说,其实仍属于沿用程朱理学的思维方式。此外,《无极主静辨》一篇在回护周敦颐之说,《慎微》《显微》两篇则旁采《诗经》《尚书》以证朱子心性之论。

余廷灿一直以汉学家的身份名于世间,学界对他的义理观点关注极少。平实而论,上述余廷灿诸篇论述义理的文章,大多都是沿袭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与思维方式,并无多少创新。但从此亦可窥见余廷灿重视义理,不废宋学的治经主张。推而论之,余廷灿在研究经学上确有汉宋兼采的取向。

---

① 王文清:《考古略卷二·经礼曲礼考略》,《王文清集》(二),第 582 页。
② 余廷灿:《寝衣辨》,《存吾文稿》,嘉庆六年刻本,第 68 页。
③ 余廷灿:《原心学》,《存吾文稿》,第 4 页。
④ 余廷灿:《原才》,《存吾文稿》,第 7 页。

2. 博综三礼,尤擅考证礼制

重视三《礼》,是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家的共同特征。余廷灿曾推崇王文清的《仪礼》学为“海内推健者”,而余廷灿亦师从王文清研治礼学。《存吾文稿》中有不少考证礼制的文字,这也是学界前辈已经有所关注的地方。杨树达为《存吾文稿》撰写提要时曾说:

> 卷一“释射”一首,取凡与射义有关之文字一一加以诠诂,与沈彤《释骨》、任大椿《释绘》、孙星衍《释人》体例略同,而博洽亦复相类;《旅酬考》《九献考》二篇,融会经文,条举件系,令读者于繁复之礼制一览瞭然,最为详核。他如《寝衣辨》据《说文》证寝衣之为被,《輗軏考》引戴震、阮元之说而加以申证,皆考核详明,不为肤论。①

杨树达所论诸篇,确为《存吾文稿》中考证礼制的精湛之作。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旅酬考》《九献考》诸篇,“皆推阐不深,固未足以经学名家也”,并说“其考证名物,信无以望并世吴皖诸儒”。② 而在张舜徽晚年所著《清儒学记》中却对此说有所修正,他转而认为上述考证礼制诸文皆是余廷灿的“经心之作”,并认为他的治经途径“已和当时的吴、皖诸儒很相近了”。③ 《释射》援引《周礼》《尔雅》《史记》《韩非子》等书中的相关文字,条分缕析,对“射”字的本义及引申义进行了证明。《旅酬考》《九献考》均旨在明辨诸礼中的细节,对古礼今用等问题亦有所论述。

《存吾文稿》中还有《读〈曾子问〉》等篇是余氏有关三礼的作品。《读〈曾子问〉》通过《礼记·曾子问》与《仪礼·士昏礼》的对比,分析二者在记载“未成妇”上的差异。余氏最后总结道:“或曰:《仪礼》,经也;《曾子问》,变礼也。予曰:变而不失其正而后可通也……因次之以俟通经者解焉”。④ 余廷灿治礼,往往采用以经证经的方法,对比三《礼》中相关记载的异同。对于这些差异,余廷灿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类似《读〈曾子问〉》一篇则因缺少旁证则暂时存疑。余廷灿研治礼学,颇为精审,从他的论证方法、文献的选取以及对学界成果的吸收情况来看,其礼学造诣确实可以比肩吴、皖大儒。

3. 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存吾文稿》中有不少关于清代经学家的传记。如“书”类的《王船山先生传》《朱侍读学士筠传》《江慎修永传》《复纪大宗伯书》,“记”类的《戴东原事略》,皆“翔实可诵,又自有阐幽表微之功”⑤,堪称清代经学史研究中的宝贵史料。余廷灿生逢乾嘉之时,屡次获得进京的机会,能与当时一流的考据学大师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存吾文稿》中有《书〈仪礼郑注句读〉后》对清代兴起的《仪礼》学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称赞张尔岐此书为清代《仪礼》学“诸家之先导”⑥,《书〈尔雅正义〉后》对邵晋涵《尔雅正义》的纠谬之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对于经学上的疑难问题,余氏往往汇采汉学家诸说,旁征博引,以成其论断。然而,余廷灿却不迷信权威。《戴东原事略》是研究戴震生平的珍贵史料,学界已多有研究。亦有学者仅凭《戴东原事略》便认为余廷灿是服膺于戴氏之学,这是不够确切的。余廷灿对戴震之说有吸收亦有修正,他虽从未见过戴震,但对戴震“沿字以讨其词,沿词以通其意”的治经主张是深表赞同的。尽管如此,余廷灿在《〈周礼〉太史正岁年说》对戴震的观点仍有所批评,以为戴震在解释“太史正岁年”的问题上“骋其锋辨”⑦而误解了郑注。余廷灿对风靡一时的戴学有一分为二的公允之见,同样值得学者关注。

---

① 湖南文献委员会:《湖南文献汇编·省志初稿艺文志》,长沙:湖南文献委员会 1949 年版,第 111 页。

②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3 页。

③ 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第七》,第 211 页。

④ 余廷灿:《读〈曾子问〉》,《存吾文稿》,第 71 页。

⑤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存吾文稿》,第 213 页。

⑥ 余廷灿:《书〈仪礼郑注句读〉后》,《存吾文稿》,第 61 页。

⑦ 余廷灿:《〈周礼〉太史正岁年》,《存吾文稿》,第 34 页。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对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三位学者经学思想与成就的概述,可知梁启超、郭嵩焘关于清代前中期湖湘学术发展的判断是不够准确的。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经历了从崇尚朱学到师法汉学的演变,明显受到了不同时期学术风尚的影响。

除了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这三位经学家外,这一时期内的陈鹏年、罗典、欧阳厚均等人在经学领域皆有一定的造诣。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史,虽不及江浙等地大家辈出,但却有其自身的演进脉络。从清代前中期诸多湖湘经学家的治经旨趣来看,他们皆重视礼学,强调践履与实用;兼采汉学的为学方法,而不废程朱的性理之说。这些共同特征,不仅使得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对晚清湘学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影响。

A Brief Account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by Hunan Scholar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

Xiao Yongming, Chen Fe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mostly o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by Hunan scholars mad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they have done very little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made by Hunan scholars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 True that little 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made in Hunan at the turning point betwee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ut there appeared many learned scholars who followed Wang Fuzhi (王夫之) in making explanations and annot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s Yongzheng (雍正) and Qianlong (乾隆), changes took place in academic atmosphere. Some scholars who were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rote quite a lot of books about Confucian classics. Li Wenzhao (李文炤), Wang Wenqing (王文清), and Yu Tingcan (余廷灿) we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among them. Most of the Hunan scholar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ritual study (礼学) and stre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practice. They made no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an school (汉学) and the Song school (宋学)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but absorbed academic advantages extensively from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Thes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made the Hunan scholars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 but also produced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rise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by Hunan scholars, Li Wenzhao (李文炤), Wang Wenqing (王文清), Yu Tingcan (余廷灿)

(责任编辑　刘曙光)